

汤亭亭“全球化文学创作”的构想与试验

——评长篇小说《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

郭亚娟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摘要：华裔女性作家汤亭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引路人孙行者》是其致力于“全球化小说”(global novel)创作的初次实践。通过对于“全球化”文化叙事问题的探讨，汤亭亭借助这篇小说来反映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和流动性，并试图通过个体与群体的重新塑造来探讨走向现代人精神家园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作为其“全球化文学创作”的一个试验，这部小说不仅反映出其全球化小说的理论构想，同时也为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

Abstract *TrijmasterMonkey*, claimed to be Kingston's first novel, is her first literary attempt on creating a global novel.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ingston is aiming at catching the tempo of our age, a trend towards globa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multiplicity and fluidity of both the personal and the communal identity, and at raising a theoretical method of creating the spiritual home for the modern people by remodeling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This novel well reflects her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novel", and also provides a way for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关键词：全球化文学创作 文化身份 群体与个体

Key Words Global Writing Cultural Identity the Community and the Individual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作品一直享誉文坛。但是，她并不认为少数族裔作家及其作品应该被归入特定的一类文学之中，也不满足于这样一个评价，而是努力地尝试着一种自我的、乃至创作理念的新突破。这样一个尝试，汤亭亭将称之为“全球化小说”的创作，也就是本文的主题——“全球化文学创作”。

什么是“全球化文学创作”？简而言之，就是顺应全球化的时代趋势，以全球化的世界作为文学创作的场所，谋求具有主体性的“群体”在这一场所以实现表述自身的话语权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汤亭亭所突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文学创作理念，是否为现代的文学创作者或者文学批评者所接受？在此，我们仍无法进行一个整体的判断。但是，借助这一“全球化文学创作”的构想，汤亭亭展开了自身的文学实践，力图赋予文学作品以一个更广阔、更深远的现代主题。这一实践的结晶，就是其1989年推出的《引路人孙行者》(*TrijmasterMonkey: His Fake Book*)这部小

说。

本文即以《引路人孙行者》为中心，探讨汤亭亭的“全球化文学创作”的构想与试验，以此剖析这一理念与实践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尝试对这一创作方式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一、从“翻译”式的文学创作到“全球化”的文化叙事

如果说汤亭亭的《女勇士》与《中国佬》文学上的成功部分原因归结于西方读者猎奇心理的话，那么她于1989年出版的《孙行者》势必让期待着又一部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传奇的读者与评论家们大失所望。这部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与汤亭亭一贯的文风大相径庭：从体裁上看，前两部作品从一开始便贴上了“非小说”^①的标签，而《孙行者》则是汤亭亭的第

^① 《女勇士》获1976年全国图书评论界非小说类最佳作品奖，《中国佬》获1981年美国全国图书非小说类最佳作品奖。

一部小说;在语言方面,汤亭亭称,在前两部作品里,她觉得自己是在把一种语言(中文)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英语),因此在两部作品问世之后,她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使用她所熟悉的美国日常口语,于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口语便成了《孙行者》的叙事语言;从主题上看,在这部小说中,关于家庭经历和母女关系的探讨不再是重点,作家将视线转移到家庭以外的一个大环境里,思索的是在新的语境下多元文化身份的塑造、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及个人归属感等一系列当下越来越令人困惑的问题;在表现手法上,这部作品更是令人赞叹,作家对中西文化可谓是信手拈来,作品中处处充满隐喻式的典故、大量的隐语和双关语,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松散的叙事结构。难怪《纽约时报》书评称“这是一本跳跃性大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汤亭亭,5)。

或许正如文学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汤亭亭的前两部作品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与其说是为了重新塑造华裔群体的形象,谋求与伸张华裔自身主体性的话语权力,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所持有的一种“神秘主义”的想象,从而有意识地进的一种“翻译”操作。

所谓“翻译”,恰如汤亭亭自己所承认的,《女勇士》与《中国佬》这两部作品,乃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就是将中文“翻译”为英语,从而将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东方传奇设定在西方的“叙事结构”的延长线之上,构建起一个东方人正在不断融入西方文明,西方人也可以借助自身的话语结构来解读东方的可能性。不过,汤亭亭作为一个作家虽然凭借这样的创作方式获得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功,这种“翻译”式的创作实质上却使她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其一,这种创作强化了西方读者对东方世界的“异国情调”的固有印象,客观上使得华裔群体与美国社会渐行渐远。这与包括汤亭亭在内的华裔作家长久以来试图通过写作融入美国社会、“讨还美国”(claim America)所做的努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其二,对这种文学创作的“解读”也留下了一系列无法超越与克服的问题。最为根本的,就是对于读者而言,汤亭亭操纵的这样的“解读”是否合理?是否正确?西方人借助这样的“解读”所看到的究竟是汤亭亭这样一个主体性的个人,还是这一个人所代表的整个“华裔”,乃至东方世界?汤亭亭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学创作者,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恰如她自己所提到的:“30年来我都是以第一人称单数进行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狭隘的。我作为一个人同时作为一个作家还不够成熟完善,因为我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只对自己感兴趣”

(Chin, 87)。也就是说,汤亭亭先前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外在表现,还是潜在表达,皆不过是她一个人而已,并不具有什么代表性或者象征意义。由此可见,《女勇士》与《中国佬》这两部作品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非小说”的标签,其根源或许就在于,它不过是一个主体性个体的“翻译”操作而已。

因此,如何脱离“翻译”式的文学创作模式,跳出华裔群体与西方世界二元对立的传统框架来进行文化叙事,也就成了汤亭亭文学创作必须加以克服的一大难题。她曾为此做出过尝试:在《女勇士》这部作品进入到第四章之际,她采用第三人称来加以叙述,尽管就她自己而言,这一尝试仍是“相当不自然的”(Chin, 87)。到了《中国佬》这部作品,尽管小说是以一个强有力的叙述者——“我”来拉开序幕,但是到小说的结尾,“我”渐渐地消失了,转变为一个聆听者,并且是站在一个“他者”的立场来叙述。这一系列的自我认识与创作试验,也就成了《引路人孙行者》文学创作构想之源泉。

走出“翻译”这一潜藏着二元对立论式的框架,真正地利用自己的母语结构(美语)来描述被西方世界所确认为了“文化他者”的华裔群体,并且试图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形象,应该说是汤亭亭的根本目的所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这部作品中,美国社会流行的日常口语,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口语成了《引路人孙行者》的叙事语言。无疑,这一语言本身的操作,其潜在目的也就在于打消华裔群体的“他者性”,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美国社会的整体形象,乃至作为华裔本身自我身份的重新塑造。在《引路人孙行者》这部小说完成之后,汤亭亭于1989年底提出了“全球小说”(global novel)这一概念,并阐述了自身未来的创作理念:“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已成为过去。我们需要创作全球小说”(Seshachari 211)。这一理念,也就是“全球化创作”的一个理念。

走出“翻译”,走向“全球化创作”,正是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引路人孙行者》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其文学创作理念的归结,倒不如说是对“全球化”的文学创作构想的一个基本的尝试。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存在着基于“全球化创作”构想的实践,而且也潜藏了“超越”这一构想的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此为契机,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之下去摸索“全球化创作”这一理念的应有状态乃至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定位

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创作者而言,“种族歧视与

反种族歧视”——也就是“种族问题”——乃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恒久主题,同时也是一个始终难解的个人情结。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创作者的自我立场的表述和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因此,将笔下的主人公设定在以“种族问题”为核心的现实社会的矛盾中,将文学作品作为自身立场、乃至文化身份的代言,也是一个最为直接的创作手段。

追索文学史,这样的文学作品可谓不少,如非裔作家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等。不过,也有一批族裔文学创作者则是站在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伦理”的立场来描述自我的问题。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的《无形人》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之一。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谁能说我不是替你说话,尽管我用的调门比较低?”(艾里森, 536)这样“非自觉性”的最后一问,把世界上一切蜷于社会边缘的人们的“共同命运”都涵盖了进来,提示世人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究竟谁来表述我们自己,尤其是在我们失去了自我表述能力的时候。由此,这部作品超越了“一类文学”的范畴,以一种普遍的情感引起了世人的共鸣。

“种族问题”的本质,是一个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与定位的问题。对于少数族裔文学创作者而言,是否选择这一主题、如何处理这一主题,无疑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毕竟“涉及种族问题不免让作品有局限之感,不够开阔;而完全不触及这一主题,则抹杀了该作家与众不同的特殊身份”(Smith 339)。就此而言,汤亭亭在创作《引路人孙行者》之际,正如其对于过去的文学作品的自我批评一样,自始至终皆是有意识地摆脱所谓的“少数族裔”的“一类文学”的束缚,试图再现一个时代的“共性”——即全球化语境之下如何归列自我的存在。那么,汤亭亭究竟是如何操作,并确立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与定位的呢?

首先,汤亭亭借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元素,将吴承恩《西游记》之中的猴王精神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年轻人的精神风貌结合在一起,并把它巧妙地安置在了华裔年轻人惠特曼·阿新这一人物的设定之中。他的身上有着不可调和的两种气质:华人的种族特征和身为美国人的自傲感。这样的自我形象塑造与歧视有色种族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培养了他一种愤世嫉俗的气质与不断反抗的精神。在此,汤亭亭力图挖掘这样一个气质与精神的根源究竟何在,从而解读为了中国文学古典世界之中的“孙行者”这一文化符号。

如果汤亭亭只是以“孙行者”的形象来表述惠特曼这一人物的心理与性格,并将之安置在中国文化与

美国文化二元对立论框架之下的话,无疑这一文学作品也就会陷入传统的“一类文学”的范式之中。就此而言,《引路人孙行者》这部作品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一类文学”,也不同于过去的半自传体文学作品,就在于汤亭亭将“孙行者”的猴王精神加以泛化,使之成为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存在。汤亭亭认为,猴王精神不仅存在于美国华裔或者其他亚裔美国人身上,在美国所有的少数族裔,乃至以艾伦·金斯堡为代表的“嚎叫的一代”等被主流社会所恶意孤立的人们中,我们皆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精神的存在。进而言之,汤亭亭正是通过书写“华裔”这一特定群体的特殊经历来折射出所有少数族裔,乃至所有人的一种共同的人生境遇和情感交错。因此,她提到:“每当我发现有非裔美国猴王或中国猴王,我都很高兴。当我发现他们都是猴王,而且他们都在美国,我就会觉得自己与非裔美国人民是密切相连的,而且会再次提醒我,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我认为很有必要去发现这样的人,这样我们彼此就能建立情感的联系”(Seshachari 206)。汤亭亭正是基于这样的“同一个人类”的身份确认与“情感的联系”所带来的共性,从而赋予“孙行者”以一个“引路人”的崇高地位。

其次,就文化身份的确认而言,汤亭亭并不是一个一元文化的固执者。事实上,她不仅将中国文化,同时也将美国文化置于了一个全球化的、多元性的文化框架之内。就此而言,“惠特曼”这一名称的设定,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其“全球化创作”的文化意识。她所勾勒出来的惠特曼这一人物以美国伟大的灵魂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姓氏为名,他是“一个伯克莱分校的毕业生,一个垮掉派,一个反战者,一个流浪汉,一个潜在的改革者,一个漫不经心的情人,一个心血来潮的新郎”(Mukherjee 279)。恰如“孙行者”可以施展七十二变的把戏一样,惠特曼“流动”于不同的身份之间,转化自如,游刃有余,以至于他人断言并不存在“真正”的惠特曼。事实上,汤亭亭正是通过并不存在“真实”的惠特曼这一命题的“假设”,赋予“惠特曼”以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从而将主人公的惠特曼、诗人的惠特曼、引路人孙行者的流动性的、多元化的身份统一地建构在了一个以“全球化”语境为背景的场所之内。

由此可见,个体身份绝非单纯地个体表述,也不应由一成不变的外在体系(如种族、肤色、地域等)来决定,而必须是由一系列内在的文化符号所组成。“一个人的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有着无限的可能,从本质上讲,甚至是可以建构,可以创造的”(叶舒宪, 84)。换言之,个人身份不仅是过去时代所留下的烙印,而恰恰是为了走向未来才必须加以塑造

的一个对象,是不断地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创造而成的。因此,到了这部小说的结尾,惠特曼已不再纠结于“非此即彼”的属性定位,他将要思索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世界公民”(Seshachari 212)的问题。这样,汤亭亭不仅成功地消解了美国社会长久以来对少数族裔身份的思维定式,更暗示着这种新的文化属性定位模式必须涵盖全球化时代里的每个个体。

三、全球化语境下的群体与个体

自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已不复过去的分裂孤立的状态,而成了一个整体。到如今,伴随着全球化意识的觉醒,一个抽象意义的“地球村”的群体概念展现在世人眼前。由此,人们开始思索:假如“群体”不再是一个局限于地理空间的概念,我们究竟将如何来界定它?如何来保障这一群体观念下的个体的存在与自由?这样一个群体观念的问题,应该说始终是汤亭亭极为关注,也是试图通过文学的创造来加以尝试解决的一大问题。

如果就群体这一概念的形成来进行一个描述范式的话,那么对美国少数族裔而言,他们的“个体”观念与其说是一个内在的自觉,倒不如说是在美国这一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下才得以觉醒的。同样,所谓“群体”的概念,最初只是基于一个家族、地域观念或者宗教团体的自我认同,只有在“个体”观念遭受到了质疑、批判之后,才得到了正式的觉醒。这样的一个觉醒,乃是代表了一个政治性的或者文化性的“群体”观念的诞生。换句话说,就美国的少数族裔而言,个体与群体绝对不是政治学领域下充满了“紧张”与“矛盾”的一组概念,而是一个彼此依托、互动交织、相辅相成的一个框架。即便是到了全球化的时代,这一框架也不会发生改变。

对于“群体”这一概念,汤亭亭曾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之中提到:“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一个群体,没有家庭和朋友,生活会是怎样的”(Rabinowitz 74)。就此而言,这一时期的“群体”观念,乃是以“家庭和朋友”为基本元素所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它并非一个地理性的、区域间的概念,而是涉及了共有的风俗礼仪、共同的经历回忆、共感的心灵觉悟的一种文化性的群体。

这一群体的文化认同观念,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汤亭亭的文学创作之中。与之前的半自传式小说以斯多克顿的中国城为背景不同,《引路人孙行者》则是以旧金山作为主人公活跃的舞台。众所周知,旧金山是一个见证了华裔族群的历史沧桑与世代变迁的城市,也是一个先后与“垮掉的一派”的诗人、嬉皮士

相联系在一起的城市,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旧金山这一城市的“现代性”,同样也培养出了“惠特曼”这样的人物。这样一个城市,恰如小说一开始所提到的,惠特曼一直想象着子弹穿过自己脑袋的情景,是一个充满了危机、缺乏归属感的社会。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人们也不得不不断地转换自己的身份。但是与此同时,作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历史场所,这一城市也会极大地刺激个体的想象,为个体提供一个以“社区”为对象的活跃的平台。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争霸”过程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契机,塑造一种多元文化和平共存的新型群体观念。

那么,汤亭亭究竟是如何勾勒这样一个契机呢?不言而喻,个体不管如何伸张与彰显,皆会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惠特曼改变了立志成为一名诗人的梦想,开始尝试招纳更多的大众来共同参与演出的戏剧艺术。汤亭亭描述惠特曼不断地结识新人,且从来不问出身,只求志趣相投,借此来探索在一个没有预设前提、没有身份观念的自由交往的社会中,是否可以出现一种新的“群体”意识。不仅如此,小说中还描述惠特曼一方面聆听不同人物引人入胜的故事,一方面也积极地充当说书人,运用想象力把中国式传奇与自己的美国经历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新故事。这样一种“对话”方式,不仅使惠特曼得到了乐趣和启发,其精神世界也随之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小说中,惠特曼的目标是创建一所美国的梨园戏社,招徕一批“包括被摒弃的一切,包括所有没有地位的人”(汤亭亭,55)来进行群体式的表演。在此,惠特曼导演的美国版“桃园三结义”带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毫无差别的友情之再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裔年轻人兰斯、华裔年轻人惠特曼与同为少数族裔的查理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们的义结金兰完全可以视为是一个“大家庭的诞生,誓言的象征”(Noelke 326)。正是通过对中国古典戏剧的戏仿,汤亭亭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拥有了共同的志趣和理想的人们,哪怕他们肤色各异、身份相别、文化不同,也有可能抛弃先见、超越种族,建立起一个兼容并包、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如果说共同参与的“戏剧表演”是主体性的个体走向群体观念的第一个契机的话,那么“即兴表演”则是汤亭亭试图再现的第二个契机。惠特曼导演的美国版“桃园三结义”之中,出现了“假战争”(fake war)这么一幕。作为该小说的副标题“His Fake Book”,早先有国内学者将之翻译成“他的伪书”。但

是,根据汤亭亭的解释,“fake”是一个音乐术语,常用于爵士乐,意为“即兴演奏”,即在音乐实践过程中演奏者在保持基本曲调不变的同时,加入自己的即兴创作。对此,“垮掉的一代”的灵魂人物凯鲁亚克,曾对这样的“即兴表演”作出过一个人文的解释:

爵士乐的即兴演奏不仅让我们得以欣赏到灵感迸发时刹那的创作,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一刻所形成的一个群体。尽管是爵士乐师一个人负责把“人人心里所思所想”转化为音乐形式,但他决不是单独创作的。“它”(灵感火花和情绪流动时所迸发出来的创作欲望)才是即兴演奏的目标。当乐师抓到了“它”时,听众们也了然于胸,侧耳倾听。随着曲子继续演奏下去,每个人都知道曲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它”是联结乐师和听众的重要纽带。没有乐师,这种集体创造就没有可能;而没有观众的欣赏反馈,乐师也只能是孤芳自赏。(Mortenson, 72)

就主人公惠特曼而言,这样的即兴创作乃是一种创造力,不需要任何的预设前提或者身份确认,也不需要质疑所谓的听众是否具备了一定的音乐细胞,只是一个纯粹的、真实的互动与交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爵士乐的世界不再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是成为消除了差别,没有隔阂的一个纯粹音乐的真实世界。恰如汤亭亭所诠释的那样,群体“不是反对个性,而恰恰是由众多不同的个性组成的”(Noelle, 329)。在这样一个音乐的世界之中,人们可以彼此平等自由地对话,不断地在这一音乐的影响下刺激自己的想象力,从而构成一个彼此信赖、彼此和谐真正的“群体”,寻找到自身存在、同时也使他者得以存在的精神家园。

“戏剧表演”的舞台,也就是世界的不同文化群体共同参与的一个舞台。这一舞台并不要求演员牺牲个性去迎合他人,而是要为个体提供了充分展现其独特性的广阔空间。“即兴表演”的方式,也就是不同文化群体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此来构成一个彼此互动、共存和谐的世界。惠特曼的戏剧尝试,不仅仅是为了谋求个性的塑造,自我的实现,同时也是以“社区”的多元文化的构建为根本的目的。这样的“社区”,或者说汤亭亭所构想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应该说正是全球化世界的一个缩影。《引路人孙行者》这部小说的本质内涵,也正潜藏于此。

四、结论

作为经济全球化产物,文化全球化在文学领域的

要求是: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模式的文学,也不是霸权文学,而是多元化的文学。世界文学必须以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准则去把握和描述人们的生活,“必须保留民族特征和风格,同时又能够代表世界最新的美学观点和发展潮流”(王宁, 5)。这正是“全球化文学创作”的精髓,也正是这个全球化世界对作家们提出的基本要求。

华裔作家汤亭亭深刻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顺应时代的要求,走出“翻译”式的自传,脱去“族裔文学”的时代烙印,走向“全球化”的文学创作,尝试探索国际都市人的“社区”文化的存在意义。《引路人孙行者》正是她这一文学创作构想的一个基本尝试。正如她2004年在复旦大学做演讲时所说的:“‘美国华裔作家’这样的名称概念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也许过于狭窄,因为每个作家都想成为全球化的作家。……我们华人有这么多人的人在写作,我们可以写世界文学。华人作家除了DNA相同外,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主题和情节都不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我们的写作去重新界定‘世界文学’这个领域”(卫景宜, 47)。

参考文献

- [1] Chin, Marilyn “Writing the Other: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Eds.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 [2] Mortenson, Erik R. “Beating Time: Configurations of Temporality in Jack Kerouac’s *On the Road*”. *The Beat Generation: Critical Essays*. Eds. Kostas Myrsiades.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2.
- [3] Mukherjee, Bharati “Wittman at the Golden Gate”. *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 Eds. Laura E. Skandera-Trombly. New York: G. K. Hall & Co., 1998.
- [4] Noelle, William A. “Parody and Pacifist Transformations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 Eds. Laura E. Skandera-Trombly. New York: G. K. Hall & Co., 1998.
- [5] Rabinowitz, Paula “Eccentric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Eds.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Mississippi University

-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 [6] Seshachari Neila C. “Reinventing Peace Conversations with Tripmaster Maxine Hong Kingston”.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Eds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 [7] Smith, Jeanne R. “Cross-Cultural Play: Maxine Hong Kingston’s *Tripmaster Monkey*”. *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 Eds Laura E. Skandera-Trombley. New York: G. K. Hall & Co., 1998
- [8] 拉尔夫·艾里森,《无形人》,任绍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 [9] 汤亭亭,《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赵伏柱、赵文书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
- [10] 王宁,《全球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1] 卫景宜,“全球化写作与世界华人文学——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裘小龙谈话述评”,《国外文学》,2004年第3期,第46—49页。
- [12] 叶舒宪,“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知识“与‘再阐释’”,《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王宁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